

战斗在资(溪)、光(泽)、贵(溪)边的红军游击队

刘建军



▲ 1938年1月，中共閩贛省委頒發堅持閩北三年游擊戰爭的紅軍指戰員的銀質紀念章

个区委。中心区委成立不久，吴先喜奉命率独立师二团返回闽北，刘文学率一个班十几名干部战士就地开展游击斗争。

红军游击队在资、光、贵边区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国民党江西、福建当局立即拼凑兵力，对游击队发起“清剿”。刘文学率红军游击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仅多次突围成功，还消灭了多支敌人小分队，夺取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粮食。随后，游击队时而江西，时而福建，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了半年多时间，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游击队也发展到近百人，胜利完成了中共闽北分区委交给的“保存有生力量，有效打击敌人”的任务。

贵溪闽坑会师

1936年1月30日，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与黄立贵率领的闽北红军胜利会师。4月，黄道、叶飞、黄立贵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中共闽赣省委，黄道任省委书记，叶飞任省军区司令员。在此前后，黄道从敌人的报纸上发现，失去联系的刘文学率领的游击队仍在资、光、贵一带坚持斗争，感到非常高兴，于是立即派吴先喜等带领四纵队（这时闽北独立师改团为纵队建制）200余人来到资、光、贵边区一带找刘文学率领的游击队。不久，两支部队在贵溪县南部的闽坑会师。

根据中共闽赣省委的指示，撤销中心区委，成立中共资、光、贵

中心县委，由吴先喜任书记，刘文学任副书记；同时还成立了抚东军分区（即闽赣省第三军分区），吴先喜任司令员兼政委，刘文学任副书记。

中共资、光、贵中心县委成立后，红军游击队立即出击，对周边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地方部队展开战斗，并一度组织攻打资溪县城。

中共闽赣省委得知资、光、贵中心县游击队的情况后，于1936年7月底派二纵队一支队政委陈仁洪率300余人赶来接应。8月底，双方在闽坑附近的坂石坑会师。根据中共闽赣省委的指示，陈仁洪所部改编为四纵队一支队，吴先喜所部为四纵队二支队。这样，整个资、光、贵边区的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为600余人。

四纵队扩编后，主动向防守薄弱的白区展开游击斗争，不仅消灭了大批敌人，还把“清剿”根据地的国民党正规军成功“引走”，从而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共资、光、贵中心县委则抓紧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武装群众，发展地方党政组织，巩固后方。1936年10月红军游击队在花桥镇战斗取得胜利后，游击区域由闽坑、白果、冷水坑、耳口寨迅速扩大到上清、塘湾、文坊一带。

随着游击根据地的扩大，中心县委又开辟了金、资、贵特区。特区包括金、资、贵交界的天台山两侧地区，最近到达金溪县黄通一带，区委设在资溪境内的上源附近。

1937年2月，吴先喜、鲍永泉

带领6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到光泽县柴家开展工作。一天，吴先喜带领6个队员下山发动群众，途中发现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正向游击队的宿营地包围过来。吴先喜临危不乱，一面组织队员开枪吸引敌人火力，一面派人通知山上的游击队主力立即转移。为了拖住敌人，吴先喜等和敌人展开激战，直至弹药用尽，又和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最后全员壮烈牺牲。

吴先喜牺牲后，刘文学接任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为了便于活动，中心县委进行了分工，刘文学、叶金太、曾广贤、苏铁仔等在昌坪、马斜、茶山、闽坑一线活动；鲍永泉、陈仁洪、谢忠厚等在金、资、贵特区一带活动。双方密切配合，成功击退了国民党地方部队对边区的进犯。

反“清剿”斗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表面上举行国共和谈，暗地里却下令全力消灭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国民党江西和福建当局调集正规军第五十二师和17个保安团及大量地方武装，对资、光、贵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对此，中共金、资、贵中心县委牢牢把握“就地坚持，长期斗争，保存有生力量，等待中央红军回来”的斗争方针，紧紧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同国民党军周旋，在险恶的环境中成功坚持下来。1937年春，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周志忠亲带一个连，从资溪饶桥到高阜“进剿”，途中遭到红军游击队伏击，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周志忠仅以身免。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正规军虽然从江西、福建撤出了部分兵力，仍不放弃对红军游击根据地的“清剿”。红军游击队被迫自卫，对国民党军进行了反击，接连在五里山、镇嵩市、珀环取得胜利后，安全返回根据地。1937年中秋节，红军游击队反击资溪县饶桥民团的挑衅，将民团全部消灭，缴获所有武器弹药。

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当局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琼崖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0月，中共闽赣省委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在光泽大洲举行和平谈判。谈判双方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编为闽赣抗日义勇军、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协议。

根据中共闽赣省委的指示，战斗在资、光、贵边区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整训，整训后编入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第二营；刘文学任第五团政治部主任，陈仁洪任第二营营长。1938年3月，第二营奉命开赴前线，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

（作者单位：江西省鹰潭市政协）

剿匪部队穷追不舍，很快将其包围并发起攻击，歼灭土匪近两千人，仅李子奎带少数人信漏网，逃进了深山。解放军各部一面乘胜追击，一面歼灭了在沿途盘踞的多股土匪，很快肃清了伏牛山北部山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解放军剿匪部队还对土匪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号召匪徒交枪登记，立功赎罪。短期内，土匪向解放军交枪、投降和自首者达千余人；拒不交枪投降的土匪，也在群众的揭发检举下，一一被解放军擒获。

李子奎率残匪拼命逃跑，却始终无法摆脱解放军的追击。为了活命，李子奎使出“舍卒保车”的诡计，宣称要和解放军“决一死战”，留下尚且追随他的手下对解放军实施“阻击”，自己乘机化装逃走。解放军剿匪部队很快全歼了李子奎的“阻击”部队，并持续展开搜捕。

李子奎眼见逃跑无望，只得潜回灵宝县马家寨，躲在一个地下窑洞里。12月5日晚，李子奎在外出时被贫苦农民发现。12月6日清晨，闻报赶来的独八团三营八连和陕州地方武装侦察队将李子奎藏身的窑洞包围起来，生擒了匪首李子奎。1950年2月23日，灵宝县人民政府在虢镇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李子奎。

史海
观澜
SHIHAI GUANLAN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邹韬奋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方针政策，积极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救亡运动。8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内容主要以时政、述评、战地通讯为主。该刊除邹韬奋外，主要撰稿人还有金仲华、胡愈之、郭沫若、张仲实、柳湜、钱俊瑞、艾思奇、杜重远等。在他的精心编辑下，《抗战》三日刊很快就获得全国民众的青睐，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力最大的救亡刊物之一。

因上海沦陷，邹韬奋等人赴武汉，于12月23日在武汉出版第30期，并恢复原名《抗战》三日刊。《抗战》三日刊出至第86期后，于1938年7月7日与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当时出至第2卷第5期的《全民周刊》（社长为沈钧儒，编辑者李公仆、柳湜）合并办刊，改刊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该刊以邹韬奋、沈钧儒、艾寒松、张仲实、胡绳、柳湜等6人组成编委会，邹韬奋任主编，柳湜任副主编。

初期的《全民抗战》“逢三、六、九发行”，为16开12页，双面印刷，没有封面，第一页刊头正上方居中写有“全民抗战”四个大字，四个大字左右两边竖排分别注有“全民动员”“抗战到底”八个字（创刊号除外）。该刊以“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为己任，设有社论、三日时事、信箱等栏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统一战线等各个方面。为了激励士气，《全民抗战》于8月19日增出了《保卫大武汉特刊》，受到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

史海
观澜
SHIHAI GUANLAN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威震敌胆的抗日部队——回民支队。这支队伍作战勇猛，屡建战功，给日伪以沉重打击，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果。

1940年2月初，为保卫发展深（县）南（部）抗日根据地，回民支队奉八路军冀中军区之令开赴衡水、深县一带开展对敌斗争。回民支队到达衡水后，在中共衡水县委、衡水县大队的配合下，连续对敌作战，很快打开了当地的局面。

当时，盘踞在衡水县城的日军为一个中队，尚未遭受过八路军强有力的打击，因此骄横无比，经常外出“扫荡”。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保卫麦收，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准备利用敌人“急于求战”的心态，将其“诱进城来”，予以歼灭。

经研究，回民支队决定通过佯攻安家村据点的方式，以吸引衡水之敌出援，然后在出援之敌的必经之路——康庄村伏击援敌。

5月29日夜，回民支队抽调一个中队，在地方武装和周围各村民兵的配合下，将安家村据点包围起来，用油桶灌炮管造出战斗声，给安家村据点敌人造成八路军主力部队要夺取据点的错觉。据点里的敌人惊慌失措，立即用电话向衡水县城

史海
观澜
SHIHAI GUANLAN

1941年5月底，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两个团由皖东北北上进入江苏邳县、睢宁、铜山地区作战，仅两个多月时间，就打垮了当地的汉奸和土顽武装，在各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邳睢铜抗日根据地。

邳睢铜地区抗日局面的发展，引起了徐州日军的恐慌。1942年冬，日伪军向淮北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历时33天，虽遭淮北军民痛击，以失败告终，但日伪军在邳睢铜境内增设不少据点，特别是抢占了位于睢宁北部的叶场村，修建了坚固的据点，并企图以此为跳板，对抗日根据地腹地进行“蚕食”和伪化活动。

为粉碎日伪的阴谋，1943年8月，新四军淮北三分区决定：以新四军九旅二十七团主力配合睢宁、唯宿、唯邳县总队和区队、乡队、民兵、武工队，采取“先困后取”的战术，消灭叶场的敌人。

围困战开始后，新四军参战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将叶场据点包围起来，消灭其周围的岗哨、切断与外界联络的电话线和取水道路，然后从西北、正南、东南三个方向据点开挖3条“S”形的进攻战壕，逐步向据点推进。

据点守敌见状，慌忙向壕沟射击。抗日军民一面取出准备好的厚实桌面和铁板，阻挡敌人的子弹，一面继续掘进，很快将壕沟挖到距离据点近百米处，又将3条进攻战壕连成一道环形战壕。

一切部署妥当后，8月12日23时，

邹韬奋和《全民抗战》

刘思琪

10月15日，《全民抗战》从第30期起迁至重庆出版。由于当时纸张、油墨等物资供应紧张，印刷、邮寄条件十分困难，该刊由三日刊改为五日刊，“每逢五、十、十五、二十、廿五、三十日出版”，仍然为16开，但页数从原来的12页增至16页，新增了封面漫画、诗歌等内容。

邹韬奋在主编《全民抗战》的过程中，得知前方将士缺少精神食粮，于是决定发行《全民抗战战地版》，免费赠送给前方的将士。此举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受到了前方将士的极大欢迎。1939年8月12日，当《全民抗战》发行第83期时，全民抗战社又针对一般读者发行了在“内容安排和文字使用上，特别通俗易懂性”的《全民抗战通俗版》，以普通群众“自己的语言和常用的文艺形式”和大量的木刻漫画，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在群众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民抗战》也因此迅速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影响较广且深受欢迎的刊物之一，销售量一度突破30万份。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轰炸，重庆出版业面临严峻的形势，《全民抗战》的出版工作也日益艰苦。从第70期开始，《全民抗战》由五日刊改为周刊，逢周六发行。

由于《全民抗战》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业绩，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嫉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全民抗战》于1941年2月被查禁停刊。

回民支队康庄歼敌

金 阔

的敌人救援。与此同时，马本斋率领四个中队埋伏在康庄村一带。

30日上午8时左右，衡水县城的日军携带平射炮、迫击炮、机枪、掷弹筒等武器向安家村方向驰援。上午10时左右，这股敌人来到康庄村前，先开炮进行火力侦察，又派出小股伪军进村探路。由于回民支队指战员隐蔽巧妙，敌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于是继续前行。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指挥员一声令下，埋伏的战士们同时开火，顿时击毙了数十个敌人。残敌为了躲避火力打击，只得丢下平射炮和重机枪，纷纷跳进路旁的道沟，准备继续顽抗。让敌人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道沟不仅直上直下、又大又深，沟底还都是淤泥。跳进道沟的敌人只能朝天开枪，欲战无力，欲逃不能。回民支队战士们追至附近，把手榴弹密集投进道沟里，消灭了顽抗的敌人。

仅40分钟，伏击战便宣告结束。此次战斗，回民支队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100多人，缴获平射野炮1门、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8挺、其他枪械百余支以及大量弹药，已方则无一伤亡。伪军除几个在前“探路”的家伙侥幸逃走外，其余均被消灭或俘虏。

叶场村围困战的七昼夜

吴小龙

新四军九旅二十七团四连、五连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向叶场守敌发起试探性攻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二十七团在重创守敌后撤出战斗，一面对据点继续实施严密包围，一面派神枪手对敌人日夜骚扰。

13日拂晓，魏集据点日伪军向叶场增援，遭到新四军伏击部队的迎头痛击，被歼灭大部，残敌窜回魏集据点。两天后，魏集敌人在上司的威逼下，再次集结百余人救援叶场敌人，结果又被新四军二十七团警卫连击溃。16日，日伪军300余人由睢宁出动向叶场增援，出城后即遭到游击队“麻雀战”的打击，行动迟缓。当这股敌人勉强推进到叶场据点附近时，又遭到新四军和唯宁县总队的联合打击。日伪军仓促应战，惊慌之中竟将炮弹倒着装入炮筒，引起爆炸，当场炸死十多人。新四军乘势发起冲锋，将敌人击溃。与此同时，叶场据点的守敌先后组织5次突围，企图和援军会合，结果被新四军打得死伤惨重，只得退回唯宁。

17日上午，唯宁县城的敌人倾巢而出，再次增援叶场，途中遭到新四军打援部队的顽强阻击，在付出惨重代价后退回唯宁。18日，新四军采取炮击和爆破相结合的方式，炸毁了据点东北角的炮楼，经过激战，二十七团指战员由西北、东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举攻入据点内，将残敌全部歼灭。

至此，邳睢铜抗日根据地军民经过7天7夜的英勇奋战，打退敌人多次增援，歼敌700余人，并彻底拔除了叶场据点。

解放军消灭豫西悍匪李子奎之战

贾晓明

1949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第十九绥靖区副司令官兼豫西第三纵队司令刘希程等，在河南灵宝地区率部起义。但该部第一团团长、盘踞在豫西为匪20余年的匪首李子奎，表面上向刘希程表示“拥护起义”，暗中却与胡宗南通电话联系，出卖了起义计划。6月10日，是刘希程等正式宣布起义的日子，李子奎竟于当天拂晓率部下伙同当地土顽惯匪偷袭灵宝县城，企图破坏起义。

解放军河南军区陕州军分区得到报告后，立即出动部队接应刘希程起义部队。与此同时，解放军华北军区第十八兵团六十军一七八师由茅津渡南渡黄河，在入陕进军中取道灵宝、阌乡，协助陕州军分区部队，向李子奎部发起反攻，歼敌千余人，并于6月25日解放了灵宝全县。随后，解放军乘势对李子奎

部残匪发起连续攻击，又在池头寨、阳平镇、上村等地消灭大批土匪，全部打通了陕西、河南间的陇海铁路。李子奎连连败退，只得带着残匪向西逃窜。

为清除匪患，中共河南省委、解放军河南军区迅速确定了剿匪战略部署，确定以陕（州）洛（宁）、南阳、信（阳）潢（川）及伏牛山东侧之鲁（山）南（召）地区为四个重点清剿区。参加剿匪的部队除军区所辖的第五十八军外，还有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和骑兵第五师等部。其中，陕洛地区以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为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四十二军副军长赵东寰任工委第一副书记兼指挥长，统一指挥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一二五师、一五五师及独八团、独九团、独十团及陕州、洛宁两分区的部队，负责进剿伏牛山北部和西部的土匪。为了实现军区的剿匪决心和部署，

河南军区又于7月1日和17日颁发了《河南军区剿匪动员令》和《河南军区剿匪立功令》。

李子奎战败逃走，被胡宗南任命为“暂一师师长”。他依仗“对当地民情、地形熟悉”，疯狂叫嚣要对解放军采取“有便宜就打，没便宜就散”的“游击战术”，企图继续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剿匪行动开始后，陕洛地区的解放军剿匪部队首先集中力量对李子奎匪部进行重点打击。

解放军剿匪部队在对小股土匪实施多次打击后，7月24日通过侦察得悉李子奎匪部主力流窜于以朱阳镇为中心的卢氏、灵宝、阌乡三县接合部，于是立即派出一五五师、一二五师、陕州分区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向李子奎匪部发起围攻。

李子奎发现解放军杀来，在稍作抵抗后，就率部向西南逃窜。解放军